

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

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发展

张红宇
著

正因为中国历史沉淀的厚重，改革导致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农民、农业、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成长的宏观效应令人瞩目；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丛书

(黔)新登字 01 号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丛书》

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发展

张红宇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 经销

责任编辑：姚必强

封面设计：黄筑生

技术设计：郑 傑

一九九四年六月贵州第 1 版

一九九四年六月贵州第 1 次印刷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1/32

7.25 印张 173 千字

印数：2100 册

ISBN7-221-03465-4/D·114

定价 5.80 元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费孝通 于光远 何 康

主 任：王贵宸

副主任：胡耻昌 王光烈 张 琦

编 委：王贵宸 胡耻昌 王光烈

张 琦 柯炳生 马国强

姚必强 (常务) 陈文辉

郭豫庆 王宽让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丛书》总序

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9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关键10年。经过80年代10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还存在或出现了不少的矛盾，如在新的条件下农民素质如何提高问题、农民生活如何达到小康水平问题、农民就业与劳动力如何转移问题、如何处理好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城乡关系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心血和努力。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为我国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

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丛书》正是响应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的号召，对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丛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影响和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决定中国现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要素之一——农民作为中心，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从自然、社会、经济多角度对当代中国农民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分析和研究。通过对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全面考察和深层透视，充分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殊地位，以寻求经过10年改革后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下，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一定能对我国的农村发展和现代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马 洪

1994年3月21日

引 言

在迈向二十一世纪之门的时刻，只要粗略地环视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回顾一下共和国的昨天、今天和展望一下明天，就不难觉察到农民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也不难发现农村改革对国民经济发展形成的巨大震荡。生产责任制像原子裂变一样释放的巨大能量，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农村经济挣脱了产品经济的束缚进而向商品经济挺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经济潜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新时期得到巨大发挥，死气沉沉的农村变得生机勃勃。新时期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改革催生的新一代农民正在成长。农业、农村、农民都在变革潮流中得到洗礼，获得了新生。

自然，十几年巨大的变革、巨大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由此掀起的冲击波可能会影响中国历史好多年。这一切都是需要记录在案的。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以农村改革为发端，进入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时期。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方面，或是在农民的生活质量方面，改革推动的发展都是今世人瞩目的。

高速度的增长动因来自改革，来自亿万农民的创造。事实上，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在取得了若干方面的实质性突破的同时，

就开始构建全新的农村经济体制,持续的改革是对旧体制的不断修正和对新体制的创新。主要方式来源于农民的自我选择。改革的基本顺序:一是以利益调整为中心,确立以土地家庭经营为内核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以组织创新为手段,改革经实践反复证明效率低下的人民公社的组织体制,确定双层经营体制,并发展农民自己选择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经济组织;三是以结构变动为主导,利用微观经营机制变革促使资源效率大大提高的有利时机,为在最大限度内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实施产业结构转换提供要素基础;四是以改善生活为目的,利用资源和效率的提高,利益结构的调整和交易条件的改善,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为实现农民生活小康水平进行努力;五是以市场调节为取向,彻底变革在农业中运行了几十年的产品经济机制,创造富有活力、富有效率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农民不仅是生产者,更是经营者。实践证明,中国农村改革是非常成功的,而改革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型经济运行机制和种种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探索经济增长之路的重要贡献。

然而,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农村改革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误的困惑。改革前期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经济运行机制变革的影响,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牵动,使农村经济与国民经济协调增长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和谐程度;而后期农业增长势头的减弱对农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以及经济紧缩中农业问题的显现,又再次表明中国农村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人认为,中国农业问题,犹如水中的葫芦,不断按下又不断冒出,波动是始终存在的。谁都会记得,几年前,当共和国刚刚以为已解决了多年农产品供给不足问题,而准备应付商品充盈前提下的需求不足时,“粮食短缺”、“棉花短缺”、“猪肉短缺”接踵而来,以至1985年成为农业经济增长与徘徊时期界限明显的分水岭。

但是,无论怎样,1978年后的农村改革历史在中国经济编年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概而言之,发生在农村的这场变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正因为中国历史沉淀的厚重,改革导致的发展对农民、农业、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成长的宏观效应才更为令人关注。在变革的大潮中;农民的成长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使农民获得新生。由于经济发展绝非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增长,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土地制度、组织制度、农民生活、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化发展、市场发展、社会化服务等诸多因素。因此,本书围绕农民与经济发 展的主题设计了如下内容。

第一章,1978年:变革的背景。以改革前农村土地制度、组织制度、产业结构和农民生活的现实表现为线索,概述导致农村变革的基本动因。

第二章,“耕者有其田”的历史抉择。着重讨论由于农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制度的变革创新,引发的体制震动和变革本身的迷惘和困顿,成功与创新。

第三章,组织系统的危机与创新。侧重分析在人民公社经营解体后,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经济纽带联结的载体何在?新的经营体制特征以及组织制度创新中的多样化选择。

第四章,农民与市场:解不开的结。则是从流通体制变革后,农民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表现;从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冲突分析中,揭示政策调整的重心与变动趋势。

第五章,劳动力:发展中的“经济墙”。是对农业资源效率提高后,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 响分析,进而对农村劳动力的现状进行剖析,并探讨劳动力转移和资源利用的多种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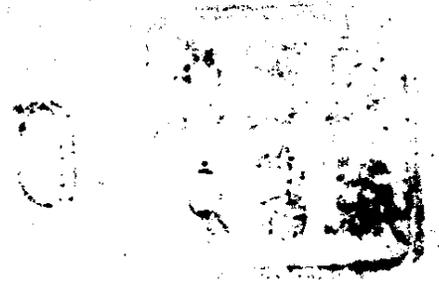
第六章,蹒跚的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是从变革时期农民的收入与支出、积累与消费的行为分析入手,进而讨论中国农民的生活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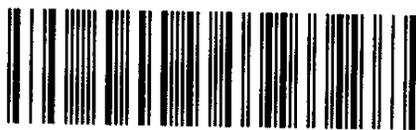
20
252
10
4

量以及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

第七章，“小生产、大服务”。本章在分析农户生产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基础上，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中心内容，研究如何在社会化服务的理想与现实冲突之间，牵住深化农村改革的“牛鼻子”，促使农民的“小生产”与社会化的“大服务”有机结合。

第八章，农民与国民经济同发展。主要从国民经济增长前景出发，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农业、尤其是粮食增长的关系，进而寻求中国农业参与世界农业分工的可能和前途。





3 0084 1756 4

95
F323
16
2

XAG 65/23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1978年:发展的背景 (1)

一、工业化梦想与基本制度确立 (1)

二、农民:产权的丧失 (3)

三、人民公社:组织上的“巨人” (7)

四、粮食·粮食·粮食 (13)

五、平均与贫困的释义 (17)

六、简略的评论 (20)

第二章 “耕者有其田”的历史抉择 (22)

一、“大包干”之秘 (22)

二、“大锅饭”的遗产与农民行为 (27)

三、步履艰难的“规模经营” (33)

四、农民与土地:情感关联 (39)

五、土地:制度变革中的创新 (41)

六、制度建设:一条漫长的路 (47)

七、几点小结 (50)

第三章 组织系统的危机与创新 (53)

一、家庭经营探源 (54)

二、相互侵入:组织空间的无序 (56)

三、让农民自我选择 (60)

四、政企分设与双层经营体制 (66)

五、有偿服务行得通吗? (74)



C

103706

第四章 农民与市场:解不开的结.....	(78)
一、统购统销:历史使命的完结	(78)
二、由“卖难”引出的话题.....	(84)
三、计划·市场·农民行为.....	(88)
四、各领风骚:农民对流通的参与	(94)
五、殊途同归——变革的思路.....	(99)
第五章 劳动力:发展中的“经济墙”.....	(104)
一、一池越蓄越多的“水”.....	(105)
二、一般规律:农业增长与劳动力等比下降	(110)
三、低效率的资源基础.....	(114)
四、越来越高的“抽水成本”.....	(118)
五、劳动积累:解除紧箍咒的有效选择	(125)
第六章 中国农民生活:质量与评价.....	(137)
一、转换时期的农民收入.....	(138)
二、消费与积累:正常与扭曲行为分析	(145)
三、农民生活质量相关问题分析.....	(152)
四、贫困·温饱·小康.....	(159)
第七章 “小生产、大服务”.....	(163)
一、“小生产”引出的大问题.....	(163)
二、社会化服务:内涵与外延	(167)
三、社会化服务:类型与功能	(170)
四、社会化服务:偏差与调整	(180)
第八章 农业与国民经济同成长	(186)
一、国民经济成长中的农村、农业、农民.....	(186)
二、中国经济成长:预测与判断	(190)
三、增长的需求——以粮食为例.....	(194)
四、资源转换: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	(200)

五、寻求优势：开放与参与	(209)
后 记	(219)

DI YI ZHANG 第一章

1978年：发展的背景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格局的变动，固然是一种历史遗传和多种现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表现出国与国之间不同的发展倾向。但是，以农民的利益为代价，以农业积累的增长为启动国家工业化的初始资本，却几乎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共同经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莫不如此。中国工业化的起步，由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遗产是如此厚重，而现代商品经济因素是那么微不足道，因此，更难摆脱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的阴影。这种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失误也是明显的。

一、工业化梦想与基本制度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有两个基本前提：可动员的资源储备和可借鉴的发展样板——国内相对于工业较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以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30年代为例，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按1933年价格计算，大约为15美元左右，排名在世界之末；其积累率为5%左右，仅为低收入国家平均积累率的1/3。几乎有2/3的产值来自农业，而来自工业的不足1/5。大多数工业产品都是用传

统手工业方法生产出来的,因而,以现代工业方式生产的产品产量还不到总产值的10%^①。而且,连年的战争使异常脆弱的经济没有丝毫改观。1949年的社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仅577亿元,其中农业产值为326亿元,占58.5%,而工业包括建筑、运输业在内也仅只有163亿元,占29.3%,商业为68亿元,占12.2%。重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在工业比重如此低水平的国度实现工业化,选择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国民收入分配由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初战略(“一五”计划时期)与苏联1928—1937年的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一是投资率从战前大约5%的水平提高到20%以上。接近于1928年斯大林的强制性工业化高峰时的水平。尽管当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仅及苏联1928年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1/4;其二是中国也将投资重点放在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生产上。除农民个人投资外的农业投资相当有限,估计不到总投资的8%,尽管农业直接创造一半以上的国民收入,拥有劳动力占总数的4/5以上;其三是优先发展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业化战略与苏联30年代的工业化战略极其相似。

而且,采纳苏联的方式,为工业化筹集资源的强制性“加速”战略和忽视农业的作法,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并且得到广泛支持。以至一些外国评论家认为:对当时世界上唯一以农民血统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②。

① [美]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155页。

② [美]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171页。

获取农业积累比较直接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对农业采取重税，即明拿；其二是通过剪刀差的方式暗拿^①。重税的方式，农民感受直接，心理难于承受，还很难保证农民不联想到过去时期的“万税”。而通过低价收购农产品和高价销售工业品的价格与价值双重背离的隐蔽方式，既可以保证工业原料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低工资，又可以保证工业品的高价格，以获取工业的超额利润。反过来国家利用这种超额利润，再次强化新一轮的工业投资。1978年以前的中国工业化，主要是采用此种方式进行的。

显而易见，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问题，最终被演变成农产品供给问题，只是单一地为了满足工业增长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于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都演化为农产品问题。农村经济成了单一的农业经济，农业经济又成了单一的种植业经济，种植业经济又成了单一的粮食经济。农民自身毫无发展可言。

如何保障既能从农业中稳定地取得更多的工业化积累，又不因此明显地损害农民的利益、形成社会动荡？中国农村长期实行的生产经营体制和组织结构，客观上巧妙地化解了不少矛盾，从而形成了1978年前中国工业化发展中的农业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二、农民：产权的丧失

经济利益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而经济利益的取得则来自对某种财产的占有并据此获得财产占有产生的利益分配。因此，与统购统销相配套，由政府直接介入农业经济活动，形成了1978年前在农村运行了几十年的产权特征。

^① 此外尚有经济诱导等方式。即通过金融机构进行民间储蓄等，但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这种方式的实施前提。

1. 在生产资料方面。除了住宅和部分自留地、自留畜外,基本耕地和大牲畜变农民所有为集体所有,限制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利,严禁土地流转以钳制地租上涨对农产品价格上升的推动作用,进而保障工业原料的低成本和居民的低工资收入。

2. 在经营组织方面。变农民个体经营为集体统一经营,将所有农民都纳入人民公社组织内,限制农业劳动力流动,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而将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的制度等,降低农民的就业机会,以维持农产品的低成本。

3. 在利益分配方面。忽视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劳动者智能、体能上的差异,以工分制度体现平均原则。而且,以财产平调的方式,保障利益分配的绝对平均化。1978年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4,收入高低倍数仅为2.88^①。说明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经济收入分配是“高度平均”的,此种分配完全不能反映不同劳动效率的贡献,是以牺牲效率来维持平均的。

4. 在产品流通方面。实行统购统销的垄断经营,关闭集市,限制区域交换,不断打击所谓“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严禁长途贩运。农民除了交纳农业税和自留部分自用农产品外,其余部分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期限、数量、价格统一卖给国家。除了专门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销统派购产品,完全排斥了市场的作用。

从产权的基本方面看,如果说由于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剥夺了农民对其产品——农业剩余的支配权,那么人民公社组织制度则剥夺了农民对生产经营的支配权。有研究表明,1978年人民公社财产总额约为14335亿元,其中地产占88.4%,而平均每个农户仅拥有3.64间住房,价值约500元,加上少量的储蓄和简单的

^① 国务院农研中心编:《生存与发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生产资料，估计全国农民自有财产不足 800 亿元^①。换言之，人民公社集体拥有绝大部分农村财产，而农民基本上是一无所有。

最大的产权丧失来自农民对土地的经营。尽管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给予了农民实实在在的土地产权，较为彻底地解决了农业劳动中的激励机制问题，因此，迅速地恢复了农业生产力。1952 年与 1949 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年平均递增 13.14%；棉花总产量年平均递增 43.15%。然而，我们并未意识到这是土地产权明晰的结果，是农民拥有彻底的产权后正常的经济行为的反应。相反却认为高速度的增长率不必依靠增加投资，而通过劳动力“天然”的生产热情，主要是通过集体化的广泛推广就可达到。把模糊产权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土地由农民所有和农户经营演变为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农户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产权主体和经济主体。而人民公社组织体制的农户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与生产大队之间、生产大队与人民公社之间的产权界限也极不明晰。在没有财产约束的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之下，产权明晰产生的激励机制丧失殆尽。产权愈模糊，劳动组织方式越集中，按劳分配就愈困难。而分配愈不合理，就愈缺乏资源配置的效率机制与劳动的激励机制。人人都吃“大锅饭”，人人都在“晒太阳”，这就是人民公社体制效率低下的唯一经济学解释。

与此对应的是归农民经营的户均 0.5—0.7 亩的自留地，其生产率虽然较高，但却经常处于被“取消”的危险之中。见表 1—1。

随着统购统销制度在农产品收购分配中的逐年实施，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变化：土地属农民私有，分户独立经营。在农户间进行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换工互组阶段（土改后阶段），土地仍属农民私有，但土地入股参与分红，农民除了劳动报

^① 李国都编：《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44 页。

酬外,入股的土地和交付合作社统一使用的耕畜、农具都要得到相应报酬(初级社阶段)。尔后取消土地入股报酬,社员的全部土地转归合作社公有,耕畜、大型农具作价归社,社员实行统一经营、统一

表 1-1 自留地变动情况表^①

年 度	种 类	占总面积 (%)	功 能
1955、1956	自留地	≤5%	种蔬菜或其他园艺作物
1957	自留地、饲料地	≤10%	种蔬菜或饲料
1958	取消	—	—
1959	恢复	5%	蔬菜、瓜果、饲料、小杂粮
1961	自留地、饲料地	5%—7%	蔬菜、瓜果、饲料、小杂粮
1962 (某些灾区)	自留地、饲料地、 借地、小开荒	≤20%	自由种植
1981	自留地、自留山、 饲料地、荒地	15%	自留种植

资料来源:原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分配(高级社阶段)。到了人民公社鼎盛时期,如果仅从经济学的利益配置角度观察,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恐怕是最为“淡薄”的了。

同时,应该注意到,农民对土地产权的丧失,并不能仅从客观环境的变化上得到全部解释。除了主观上国家迅速工业化的需要

^① 1955 年农业合作化开始后,土地逐步由集体统一经营,同时,准许农业合作社留下总耕地的 5% 由农民分散经营,种植蔬菜或其他园艺作物。自留地归集体所有,但不征公粮,不交集体提留,农民不得私自出卖、出租和非法转让。虽然在历次运动中自留地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受到批判和冲击,但它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产出,增加农民收入,因而农民经营自留地的积极性很高。参见:《农村经济文稿》1991 年第 9—10 期,第 109 页。